

## 解讀中國的「青年」歷史

● 谷杉杉



作者認為，作為社會群體的「青年」是不存在的。家國天下、教育體制、家族結構層層包裹，將青年約束其中。「青年」是近代的發明，年輕人作為挽救國族的新生力量被需要，從而誕生。

陳映芳：《「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引用只註頁碼）是陳映芳繼《圖像中的孩子：社會學的分析》（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之後，結合角色理論，以特定人群作社會學分析的又一著作。本書以年代分野，闡述了「青年」作為一種社會角色的誕生、形成，直至瓦解的全過

程，以其獨創性視角，論證了「青年」在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強大功用，重新詮釋了「青年」這一社會角色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間的密切聯繫。

本書開篇指出，在傳統中國，人自出生至成人有「幼」、「童」、「冠」三個年齡階段，而不存在「青年」一說，「代際（輩分）關係比年齡更加受到重視」，只要父母尚在，孩子必須遵守「大人—孩子」的關係，一旦發生代際交換，無論其生理年齡大小，都將被置於大人的位置，「理所當然地被授予與其地位相當的權力，並被要求扮演成年人的角色。」（頁6-7）年輕人「對父母的精神上的、生活上的依附都被倫理規範和家庭制度所規定。」（頁8）他們作為家庭成員的身份被強調，但作為社會群體的「青年」是不存在的。家國天下、教育體制、家族結構層層包裹，將青年約束其中。作者認為，「青年」是近代的發明，年輕人作為挽救國族的新生力量被需要，從而誕生。

從本書中對青年階層形成的論述看，作者將民族危機與近代中國教育的變革看作青年階層形成的主

要誘因。近代中國教育系統的建立及逐步制度化，開始有了對「兒童期」、「少年期」、「青年期」的區分。新式學校的設立與教學內容的變化，使年輕人在身體和精神上離開家庭與傳統成為必然，總體上構成年輕人從家族移向社會的結構性置變。作者選取梁啟超的「少年」論，分析了促成青年承擔起「國家人才」角色期待的社會意義。由於中國歷次改革與對外戰爭的失敗，民眾對衰老的帝國愈發絕望，代之而起的是對象徵着朝氣蓬勃的青年學生的期待，「青年」被認為是建立新的中國的當然人選，在社會崇拜中被普遍地賦予了背負國家命運的責任，「而年輕人也開始將承擔上述義務視為己任」（頁48）。

從《新青年》的誕生到「五四運動」，青年的社會地位得到確立，正式承擔起社會期待。書中提到：《新青年》的發刊「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社會中『青年』這一角色類別形成的象徵」，因為「從《新青年》開始，『青年』的概念作為一個獨立的角色類別得以明確化」。「新青年」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隱退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頁61）。他們反抗傳統體制和倫理道德，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被冠名為「五四青年」。

另外，「五四運動」以其巨大的影響力被不斷解說，雖然說明者的立場和時代不同，但有一點是不變的：即為「青年」賦予各種各樣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從『五四運動』起，『五四青年』便開始被

視為『青年』的角色模型。而各種社會的、政治的勢力也開始通過對『五四青年』的意義結構的規定來驅動『青年』」（頁71）。可以說，從「五四青年」開始，青年就因其功用性被有意無意地塑造着。「五四」呈現給我們的是青年的群像，作為個體的人的價值並沒有受到重視。作者將這一時代社會對「青年」的角色期待歸結為青年的「有用性」，「人們並不是從對年輕人的特性、欲求和權利的認知出發對年輕人這個年齡群體作出高度評價」，而是從「社會的需要出發承認他們的價值」（頁80）。

「五四運動」後，學生和青年知識份子仍是基於由「五四運動」建構成的「青年」的意義結構來表現他們的角色。他們普遍選擇了激進的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主要是出於反對國家權威，追求民主、自由和個人權利的願望。陳映芳特別說明，共產主義之所以為青年的「主義」選擇之一，「相對於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等意識形態區別，他們更看重其中關於『平等』、『反專制』、『徹底改造中國社會』的理念的相近」（頁137）。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青年呈現給人們的主流印象是激進的、向上的、飽含熱忱的，他們承載着國家的命運、國民的期待。他們是「五四青年」的延伸和擴大，其存在和受到崇拜的原因仍是其功用性，而青年的這種實用價值從1949年這個標誌性的年份開始，進一步被強化和發揮。

建國後，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與青年一樣如同「八九點鐘的太陽」，青年因其革命性象徵了這個新興國家誕生的意義，社會到處洋溢着對

從《新青年》的誕生到「五四運動」，青年的社會地位得到確立，承擔起社會期待。從「五四青年」開始，青年就因其功用性被有意無意地塑造着。「五四」呈現給我們的是青年的群像，作為個體的人的價值並沒有受到重視。

建國後，上一代「五四青年」的角色被「革命青年」成功置換。「革命青年」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價值觀；擁有服從、忠誠、獻身等革命精神。社會政治化教育的結果是，培養出一代既「革命」又「順從」的「革命青年」。

青年的讚美和熱切期望。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高呼「青年同志萬歲！」，青年在政治上獲得了高規格的待遇，如5月4日被確定為「青年節」，12月9日被確定為「學生運動紀念日」。黨和政府有意識地發揮「青年」的角色功能，「青年被組織到共產主義青年團、民兵以及青年突擊隊等各種組織中，在共產主義的指導下，在各個領域展開社會的、政治的活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的角色擔當者。」(頁166)

書中用「革命青年」的概念對從1949至1978年間的青年進行角色分析，他們仍以完成一定的歷史使命為主要內容，但基本構成和意義結構卻發生了變化。「革命青年」的主角是工人農民，知識青年有必要與工農民眾相結合；「『革命青年』被定義為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鋒、共產主義接班人。」(頁171)「革命青年」要有着這樣的特質：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價值觀；擁有服從、忠誠、獻身等革命精神。作者通過對青年角色模型英雄人物(如雷鋒)的考察，分析「革命青年」的角色規範。雷鋒被塑造為「革命青年」價值觀與道德規範的完美擁有者，是忠誠的、具有「革命螺絲釘精神」的「革命青年」。

青年被最大程度地進行政治化教育和「思想改造」，黨以人民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將政黨與國家和人民融為一體，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國家權威至上的觀念正當化、絕對化，同時黨政指導進駐事業單位，青年的管理及制約制度化的「檔案」管理，統一培養、針對青年學生的意識形態監控下的遴選體制，成為

整個社會對青年的取捨標準，上一代「五四青年」的角色被「革命青年」成功置換。社會政治化教育的結果是，培養出一代既「革命」又「順從」的具有雙重人格的「革命青年」。隨着現實政治中對「帝、資、修」等「階級敵人」的鬥爭被反覆強調，革命暴力的正當性得到肯定和美化。但是很明顯，「革命青年」的暴力和順從相互並不衝突，「革命青年」的「反抗」正是「以對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響應、服從為前提的」(頁202)，這種互動關係，造就了整整一代的文革式青年。另外，作者還指出，無論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定位，還是「革命青年」主角的結構性置變(工農兵成為主角，青年知識份子從主角和「啟蒙者」變成被改造和教育的對象)，都在說明「青年」的地位在趨於下降。

隨着文革的結束，文革時代的「青年」作為一代營養不良的產物，文化嚴重缺失；同時，對文革的清算和否定，青年對社會既存的居支配地位的價值觀產生懷疑；實行開放政策以後，處於信仰危機的中國社會，被歐美文化「趁虛而入」。在強勢的意識形態之外，「主義」多元化，與官方正統教育相並存的現實文化對青年產生了更具現實的引導力。於是，與「革命青年」南轅北轍，脫離崇高理想的「個人本位」的「自由青年」開始出現。

隨着社會的開放和社會價值觀的多樣性對政治教化的中和，大眾與官方對青年的自由取向表現出寬容和理解，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有了一定的正當性，這種非正統的意識形態取向，或者說取向的多元

化，使「青年」作為群體的社會政治功能喪失，他們的救國和革命功能不再被需要，「青年」解體，趨向對年輕人的回歸。另外，「青年」解體，年輕人對信仰的缺失和「不經意」，不是一個群體中的個別現象，也不是單純由青年開始。中國社會先有文化上的「孔家店」，作為千年文化的罪惡總代表被否定，後有政治上意識形態約束能力的衰弱，以及社會的多元化等種種因素，促成整個社會作為群體的「一致性」消解。

本書圍繞「青年」這一年齡群體，將其社會角色的形成、強化到解體的歷史沿革做出全面理清，以

獨特的社會視角構建出一部「青年」的歷史。最後作者總結道，「青年」社會角色的形成源於其功用性，也正是因其功用性的喪失而失去了主角地位。「青年」角色功能的衰退以及現代社會對家庭價值的重新認識，促使「『孩子』再度成為統合兒童、年輕人與社會的相互關係的最為重要的媒介」（頁259）。「青年」在宏大的歷史變遷中經歷的是從無到有再到解體的過程，但是，以「孝」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在中國一直佔據着主導力量。從本質上說，年輕人作為「孩子」的角色在父母及家庭層面從未改變或受到否定。

隨着社會的開放和社會價值觀的多樣性對政治教化的中和，使「青年」作為群體的社會政治功能喪失，他們的救國和革命功能不再被需要，「青年」解體，趨向對年輕人的回歸。

## 清代的漢口：城市、地方精英與公共領域

● 胡悅晗



羅威廉 (William T. Rowe) 著，魯西奇、羅杜芳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 (1796-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西方主流城市史研究認為，東方專制下的帝國城市強調的是政治和軍事職能。把儒家所謳歌的田園牧歌作為理想生活方式的城市官吏很少能夠將城市本身作為其終身居所，他們為帝國工作一定年限之後告老還鄉，從而無法形成具有城市認同和歸屬感的永久公民。少量的